

# 从《牧羊儿》到《漳河水》

□阮援朝

1944年1月到1947年1月整整三年的时间，是阮章竞创作的空白期。

在这之前，他以笔名“洪荒”创作了许多戏剧，基本是太行山剧团的职务创作，多数由他自己导演。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只有《未熟的庄稼、糠菜夫妻、比赛》三部。佚失的戏剧文本中却有《秋风曲》《牧羊儿》两首插曲，在民间口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被基层文化馆收集进了民歌集，才重新回到作者手中。

在阮老的太行山时期笔记中，有一本用纸捻装订的麻纸手稿——《四幕秧歌剧 南王翻身谣》，写于1946年9月，是他以笔名洪荒写的最后一个作品。剧本后附曲谱16页，是他用民歌调为歌剧填写的20首曲子。曲牌名有：闪扁担、采花、扭扭丝、石片、刚调(有变奏)、西京调(有变奏)、快板(无谱)、落子、等待、花五更、剪剪花、长城、马蜂窝(有变奏)、反五更、紧符(有变奏)、种树收果、死过的人(有变奏)等17种。这部作品并未排演和发表过，却是阮老转入民歌创作的承前启后之作。

说承前，是因为早在1940年，太行山剧团就排演过阮老创作的四幕歌剧《和尚岭》，剧本灭失在战争中，插曲《牧羊儿》靠口头流传得存。阮老在回忆录中说：“从《牧羊儿》中可以窥见我的诗歌创作的民歌道路，也可以发现我的戏剧创作向民间学习语言，学习民歌、民间、民谣的痕迹。”

说启后，是自此四个多月后，阮老的民歌体诗歌、戏剧的创作就进入了高峰期，他也用回了自己的本名——阮章竞。1947年的创作简单列表如下：《送别——记豫北某村参军小景》(1947年2月7日)，《圈套——假歌故事》(1947年2月)，《盼喜报——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信》(1947年3月28日)，《赤叶河》(1947年9月)，《妇女自由歌》(1949年8月)。其中，《送别、盼喜报》都是80行左右的短叙事诗，分别是母亲送儿参军和军嫂在家鼓励丈夫早日立功的人物速写；《妇女自由歌》是在赴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火车上，为文工团演员郭兰英以填词方式写的一首民歌联唱。而《圈套》则是一首有十章680多行的长诗，讲述了一个老财设计陷害年轻农会主席，终未得逞的故事。歌剧《赤叶河》的首演，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工作会议上(1947年10月2日—12月26日在武安县洺陶镇召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12月28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就组织了《赤叶



河》座谈会。

1948年3—6月，阮老参加了太行区党委组织的安阳土改工作团，任团委，驻东西积善村进行土改复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记下了八万字的笔记《乡间记事(续)》。1949年1月18日，阮老参加了在涉县东戌村召开的太行区党委妇女青年工作会和1月30日召开的太行区妇女临时代表会，也留有笔记。《漳河水》的创作冲动，就在这时被触发。

纵观阮老民歌创作期的完整过程，可以看到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相互缠绕，互为表里的血肉关系，这也是红色经典的创作源泉。阮老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他只是个党的“群众工作者”，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是自己应该时刻重视和钻研的大问题。前方的文化人，有为战争服务的直接任务：扩军、征兵、支前甚至更具战略意义的政权建设，所有的艺术、作手段，都要调动起来，让作品打动人心，团结共进以完成这些工作。他要从一个说中山隆都话的“南蛮子”，修炼成能够熟练运用方言土语的晋冀鲁豫乡党。他暂时离开文化工作时，思考过战争结束后的选择：“文化工作是否像在战争中一部分同志的认识一样——无异轻

重？我也不希望能做什么，能和在实际、底层联系的地方，如在农村、工厂，做个很简单的工作(就好)。我仍喜欢以他们的生活来引导他们，其余的别无他求。”

文学艺术是阮老和他的战友们做群众工作的工具和武器。他们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认同和遵循，是从个人体验中来的，是对领袖高屋建瓴的总结升华的高度认同和遵循。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活力激情、才华智慧为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着理想的实现而迸发出来，收获了未曾刻意追求的文学成就。

《漳河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时代氛围，活脱的民间语言，传神的人物形象、精巧的剪裁结构打动了广大读者。也获得了茅盾、顾随、王瑶、谢冕等的赞赏肯定。

顾随先生1952年12月所作的《评点漳河水》，将其放入了古典诗论的语境之中，就诗歌的手法、文势、句法、叶韵、遣词、节奏做了评点，并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张祜的宫词《何满子》、宋词《望江南》《破阵子》的歌拍句法等进行比较。对诗中二老怪的描写，顾评说：“一笔一转，总无平笔”；“插入松笔，文势更紧”；“笔亦踩石成坑也”。对诗中荷荷苓苓找紫金英谈心的描写，评点说：“闲闹而起，人情入理。行文如此，真乃乐事。”……

王瑶先生在他1954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送别、圈套、盼喜报、漳河水》和《赤叶河》都做了评介。

茅盾先生在1960年对《漳河水》做了60多处眉批，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特别新鲜。”

2010年，谢冕先生把《漳河水》全文选入了他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50年代卷》，表示这就是他向阮章竞先生表达敬意的方式。他评论说：当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诗人们还在礼赞“革命的狂飙骤雨”时，阮章竞先生所表现的革命胜利，已经是更深刻更深邃的，钻入人心的变革了。他笔下的长诗展现了革命带来的内在成果：那就是人的改变，人的命运的改变。在狂风暴雨的同时，还有温柔的，春雨般滋润的，春风春阳一般温暖着人心的改变。在诗歌写作当中的这一点，是阮章竞先生的贡献，包括他的歌剧《赤叶河》也是这样的一种创作。

在《漳河水》的末尾，阮老题记“1949年3月26日初稿完于卧虎坡”。涉县文化馆的李亮老

人考证说：“卧虎坡就是东豆庄村，理由有二。其一，2月初，诗人列席罢妇女会，重访故地；诗人创作的火焰一旦点燃，素材一旦得到充实，创作会立即进行，不会像今天的一些作者，另找别墅去写诗，更不会把戏剧部的工作全部抛开长达20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东豆庄古名就叫卧虎村，因位于卧虎山坡而得名；坡上另一村叫西卧虎。因两村与相距5华里的武安县重镇阳邑毗连，风水先生说，阳(羊)邑被两只虎吃着，极为不利，遂仗着村大势强，硬逼着两个小时改为今名，以便阳(羊)邑吃住豆庄(参见《涉县地名志》)。极善搜集民俗民谣的诗人，不会在他的驻地听不到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在太行山西麓的清漳、浊漳流经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和他们的后代，对《漳河水》都怀着美好的情感。我数次追寻父亲的足迹，在武乡、长治、黎城、左权等地寻访故地，只要提到《漳河水》，即使是初次相见，彼此都感到亲情交汇，如久违的老友一般。

涉县西戌镇是阮老那些民歌体作品的创作地。2018年秋，西戌镇文化馆的同志邀我参观村里的太行区文联旧址和父亲的故居。在古老破旧的院子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老房东后代抱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旧箱子，打开给我看。箱盖的内侧平整地裱着检字表，有一格一格的排字模，仅存的铅字暗淡无光，铁皮箱体锈迹斑斑，只有检字表还清晰可辨，一切都是革命文化在这个小山村流逝岁月中的遗痕。走出院门，西戌小学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狭窄坑洼的石板巷子里，用清亮的童声背诵了《漳河水》开头的《漳河小曲》。这是人民政权胜利后的几代人了？被人铭记在心里，并且愿意传下去的文学，就这样彰显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涉县人热爱家乡之河——清漳河，而阮老的《漳河水》深刻表现了漳河两岸乡亲的喜悦欢乐，他们就给了我慷慨热情的接待。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专门来陪我去看涉县的红色圣福天路。路上，他说，县里修了一处《漳河水》诗墙，不想去看一看？当然想看，急不可待地想看！

沿途，一个个在阮老的文字中早已熟识的地名路标，向眼前滑过，又退出视野：偏城——是



阮章竞

1942年5月下旬夏季大扫荡，阮老正患伤寒住院，奉命编组疏散的出发地。5月25日，在石门沟东壁，他们的病号小组目睹对面山上总部被围，敌机轮番轰炸，激战竟夜，左权将军和阮老的众多战友，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悬钟——1941年阮老率领的太行山剧团在这个村子里庆祝过建团三周年，写下过剧团的团歌；悬钟还是1942年1月太行文化人座谈会的召开地，会议的名称在父辈的笔记里叫作“对敌文化斗争座谈会”。下温村——太行区文化单位驻地，阮老在这里写过《糠菜夫妻》和《柳叶儿青青》等作品……

车子盘上涉县城东的韩王山。未久，一组园林景观出现在路边，三米多高的石碑上刻着“漳河水”三个大字。诗园的入口，刻有“卧虎坡”的青色巨石透出涉县人的自豪。一段与黄土高原同色的石墙长长地延伸着，镌刻有《漳河水》的三部曲：《往日、解放、长青树》。漳河边上三个姑娘荷荷、苓苓、紫金英，活在诗墙上中国气派、乡土气息的诗句里。从诗墙往山坡下走，崖边凭栏，视野开阔，可以俯瞰丝丝带般的清漳河亮晶晶地从宽阔的河谷中流过。极目远眺，岚雾深处的千山万壑后面，就是《太行山上》歌声曾经笼罩过的太行山腹地。横过漳河的，是通向黎城、长治的大道。古称“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就是此道穿过的关隘。在这条古老的滏(郗)长(治)大道上，八路军故战场的纪念碑沿途耸立，响堂铺、东阳关、神头岭……涉县人民将《漳河水》诗墙建造在这个地方，阮老的诗魂便可盘旋在他被视为红色故乡的上空，与他的战友们共同祭奠那出生入死的无悔青春和迸发难收的创作激情。

从《牧羊儿》到《漳河水》，这批民歌体作品所蕴含的父辈铁血经历以及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脉交融之情，使我深深懂得了红色文学经典的不朽，究竟奠基在哪里！

# 新中国的工业文学与《原动力》

□田海蓝 张思一



曹明

在这位老工人的心里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他觉得什么事情只有大家一起来干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镜泊湖发电厂给作家草明上的有关中国工人阶级伟大胸怀和高尚品格的第一节课！而想要了解工人，必须首先走进工人的日常生活。草明发现工人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她认为新解放区，特别是处在山沟沟里的交通不便的工厂，更应该办个学习班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她亲自教工人们学习文化。草明的建议立刻得到了李书记和宋厂长的支持，他们马上就找了一间屋子做课堂。草明不但讲政治课，而且教工人识字、写信、作文、算术，还给大家讲长征、讲延安的故事，每每讲到这些时，全班的工人们都听得鸦雀无声，还有人感动得直擦眼泪。一次下课后，草明发现邹师傅曲着腿在课堂外面的墙根下坐着，草明赶紧扶他起来：“邹师傅，你怎么不到里面坐？”邹师傅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收我这个大把岁数的学生吗？”“你说到哪里去了？你是先生，我才是学生呀！”从此邹师傅和草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老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写于1948年，迄今已经73年。草明根据自己了解到的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的真实故事，写出这部小说。《原动力》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的小说，被誉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之作。围绕它成书的过程也有着颇具曲折的故事。

1947年2月，时任东北局妇委主任的蔡畅同志忽然调草明去妇委工作，帮助整理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法国出席“国际妇女大会”代表的材料。完成任务后，经蔡畅同意，草明于1947年5月初，拿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向往已久的牡丹江电业局的镜泊湖发电厂去体验生活了。

镜泊湖发电厂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端百余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发电厂李书记和宋厂长向草明介绍了发电厂不同寻常的历史：它曾经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实施“以战养战”的历史产物。在牡丹江临近解放、国民党的接收人员逃跑前，命令工人把发电的机器都破坏掉，工人邹师傅哄骗敌人，故意开水闸放水，让厂房结成坚冰从而保护住了机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城市的照明和工厂的开工都急需需要电力的支持，牡丹江电业局长何纯渤等人去镜泊湖发电厂探路，他们赶到发电厂时，却发现这里的工人们在宋厂长、邹师傅的带领下，早已把把厂房、机器都修复整理好了，镜泊湖发电厂成为东北地区第一个恢复工作的发电厂，为解决关内地区、为新中国的初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厂长还详细地介绍了那位老工人邹师傅当时是如何带头跳下污水池里捞润滑油，如何带头清除厂房的坚硬的冰块的事迹。草明找到了老邹师傅，可是这位50多岁的老邹师傅直截了当地回答：“事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呗。”“听说你是你带头说服大家一起干的？”草明急于了解事实的真相，“咳，哪里用得着说服，大家干就是了，一干不就把手干完了吗？”草明终于明白：不用再问了，再问邹师傅也是不会说的。因为

作，我写工厂的事行不行？”不料刘芝明同志却很高兴地笑了：“写工厂的生活与斗争当然可以，现在正缺写工厂的书呢！”周立波、马加他们齐声说道：“写吧，写吧，写工厂很好嘛，我们还想看哩！”在大家一阵阵掌声和鼓劲声中，草明确了自己在写作上新的奋斗目标。妇委的蔡畅听后很高兴：“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在妇委写，就在我楼上你住的房间里写吧。没人打扰你。”

一天晚饭后，蔡畅邀请草明下楼来，原来是负责全国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同志来了。蔡大姐介绍道：“草明现在在这里写呢。”李立三同志很好奇，问草明写什么。当他知道草明是在写镜泊湖发电厂的工人英勇事迹后，高兴地说：“好啊！是该给工人阶级鼓劲的时候了。工人阶级在工业第一线正是要出大力、干大业的时候。作家就是要瞄准这个形势先走一步嘛！”李立三同志说：“写作限定几个月是很难的，可是，6月份总工会要召开全国各省的代表大会，要是有一本反映工人勇于献身工作，迎接全国胜利解放的书，对工人阶级无疑是个鼓励。所以我也希望你的书能赶上这个大会！”草明听了，决心为大会而努力。

不到三个月，草明就把8万多字的书稿写完了，刘芝明同志请了周立波、马加等几位作家提意见，草明再进行修改，最后定书名叫《原动力》。草明请人把书稿送给李立三同志审阅，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李立三同志就把书稿送回，并且附上一封亲笔信，祝贺草明写得成功。为了赶时间，经过书店出版部门的多方努力，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终于在全国总工会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结束的那一天，带着还未散尽的油墨芳香，送到与会代表每个人的手里。代表们激动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了一本描写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书，而且写的就是他们的劳动生产、搞建设的事！既感到很亲切，又感到很自豪。上海纱厂的代表汤桂芬说：“看了这本书，今后上海解放了，我们做工会工作的就有了榜样了。”

当时刚从香港回国的郭沫若先生，认真地读完了这部小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给草明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们拿笔杆的人，照例是不擅长来写技术部门，尽力回避。你克服了这种弱点不仅写了，而且写好了，写了技术部门的文字，恰到好处，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有的硬性中和了……我庆祝你的成功，庆祝这第一部写工人作品的成功。”

本国文字出版。

有趣的是，为工人呐喊与宣言的《国际歌》和《原动力》竟然相辅相成，同时起着激励与教育工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工厂的生产面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这个厂在北京和平解放后，是由十八个破烂机械拼凑起来的，只用了年多的时间，工厂就发展成为新中国机床行业第一个铣床龙头企业。

第一机床厂的宣传干部张锡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一件事：从市总工会的培训班回来的于万祥师傅，给大家带回来了两件珍贵的纪念品：一件是《国际歌》，另一件就是草明的书《原动力》。他说：“这可是本好书哇！至今描写咱们工人当家做主人搞建设的书，还只有这本《原动力》是头一份的大书呢。大家要好好学人家老孙头(书中主人公孙怀德)，当个好样的主人！”这是老陕(指毛岸英同志)要点的那种书。当天傍晚，在集体宿舍就响起了一阵阵的《国际歌》。待嘹亮的歌声一落，就又响起了《原动力》的朗读声。仅仅一个多星期，《国际歌》与《原动力》就把大家的精神状态改变了模样儿。一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就扬眉吐气，自豪无比。工人们听了草明的《原动力》，一啜摸，一回味，草明在《原动力》中写了旧社会当牛做马的人们成为了新中国主人，把这种新生活的全部亮丽色描绘出来；而且奉献给了新中国的主人们，激励他们全心全意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如果说《国际歌》是天下工人阶级呐喊与宣言的歌，而《原动力》就是中国本土版本的‘牛马变主人’的一支副歌，因为两者有着一脉相承的主题与描写对象，这是当年工人们爱听《原动力》最直接的原因。”

草明曾说过：“小说《原动力》的名字是书写完时才定下来的，是根据书中结尾处几个人物的对话自然而然形成的，意在说明，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动力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就在我们写作此稿之时惊喜地得知，草明当年深入生活的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专门建立了一个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原动力广场，定于2021年七一前夕的6月18日举办启动仪式，并同时将演出红色教育舞台剧《原动力》。一个作家的部小说在一个企业中，竟然能有这样重大的政治影响和时代作用，这是今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们怎么也想不到的！



文学战线创作丛书

而茅盾先生更是高兴地做了一番仔细的比较和研究，他在信中写到“《原动力》拜读过了，写得很好。特别是因为现在还很少描写工业及工人生活的作品，所以值得珍视。……我想我不应该和您绕圈子说客套话。我说，《原动力》是关于这方面的第一部中篇作品，在今天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原动力》在政治上把握得正确，那是一眼就看得见的。其次，它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那也是毫无疑问的。”

1950年10月16日，草明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她的《原动力》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均被译成英文版，这两部作品成为让世界人民了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真实面貌的最新窗口，这两部中国小说在大会上被各国代表争相购阅的热烈情景，一时间传为佳话。

《原动力》的问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东北书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苏北、浙江等中南各省市的新华书店纷纷出版了《原动力》，香港学林书店把《原动力》改编为《新文艺连环画》上、下册出版。与此同时《原动力》也迅速走向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53年间，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德国、英国、日本、朝鲜等国都翻译成